

朴城君
著



大邦之间

妙香国的观世音图像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朴城君
著



大邦之间

妙香国的观世音图像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邦之间：妙香国的观世音图像志 / 朴城君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 7

ISBN 978 - 7 - 5668 - 2190 - 4

I. ①大… II. ①朴… III. ①南诏—观音—造像—介绍 ②大理（古族名）—观音—造像—介绍 IV. ①K87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2530 号

大邦之间：妙香国的观世音图像志

DABANG ZHIJIAN: MIAOXIANGGUO DE GUANSHIYING TUXIANG ZHI

著 者：朴城君

出 版 人：徐义雄

策划编辑：古碧卡

责任编辑：刘慧玲 刘 亮

责任校对：邓丽藤

责任印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广州市穗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4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自序

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各种宗教信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南诏大理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较诸其他宗教深远许多。文献上说苍山与洱海是“佛教之齐鲁”，以此来形容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文化浸淫之盛。南诏大理国的许多别称，也与佛教渊源极深。南诏大理国往往被称为“鹤拓”“妙香国”。“鹤拓”是“乾陀罗”（Ganhalaraj）的音译，据《一切经音义》释，“乾陀”是香，“罗”是遍地，意为这里生长着有香气的花草，因此南诏大理国又被称为“香遍国”。很显然，南诏大理国被称为“鹤拓”“妙香国”，是“乾陀罗”之名移植到洱海地区被梵化的结果。“妙香国”，就是佛国之义。《白古通》云：“苍、洱之间，妙香城也。”^①“《白古通》载释迦佛在西洱证如来位，即梵经谓灵鹫山为释迦说《法华经》处。”^②“迦叶尊者繇大理点苍山入鸡足。”^③“大理古泽国，又名灵鹫山，又名妙香城，又名叶榆池。”^④

如此，大理就是妙香城。释迦佛涅槃后，其大弟子迦叶由点苍山入鸡足，持衣钵待弥勒下世，叶榆池指西洱河，即成为释迦证悟如来位的恒河。伯希和说：“越南半岛（即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化（佛教化）之民族，咸有在其地建设一新印度之习惯，曾将印度地名移植于其国内，有时将本地之名梵化，有时竟以印度之名名之。”^⑤可见云南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化的深切。云南洱海、滇池地

① 李元阳：《大理府志》卷二，大理州文化局翻印本，1983年，第58页。

② 李元阳：《大理府志》卷二，大理州文化局翻印本，1983年，第88页。

③ 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七，康熙刻本，北京图书馆，1988年，第5页。

④ 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七，康熙刻本，北京图书馆，1988年，第5页。

⑤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南之梵名”，中华书局，1955年，第22页。

区浮屠遍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天佛国”。而观世音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成为最主要的神祇，观世音信仰和密教成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信仰的中心，观世音的地位甚至高于释教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南诏大理国的佛教信仰以密教为主，衍生成独有的阿吒力教，还有“释儒”等身份特殊的僧人。王、相、巫、民信奉佛教的阶序性、本土性、杂糅性无疑对佛教造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考察这种迥异于内地，区别于印度、中南半岛的带有强烈民间信仰色彩的佛教艺术造像，尤其是占有显著地位的观音造像，无疑会为此领域研究带来启迪。

本书拟以妙香国的观音造像为主要考察对象，旨在探求观音造像在其时其地的流衍，并试对一些妙香国独具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研讨，研究的限定时段大致为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大理可分为两个迥然相异的文化时空：前者游离回旋于唐朝与吐蕃这两个大邦之间，连年杀伐征战四处掳掠，开疆拓土大兴土木，所以对外交流频繁错综，佛教造像面目自然更迭多变并注重佛教神祇的护佑息灾功用；后者示好于宋朝，屡屡愿为臣属，国泰民安，室室奉佛，王、相亦接连避位为僧，所以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大理国的实际管理者和扮演中原居士身份的权相高氏一门自然成为考察的主线。那么本书拟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掘进：云南观音造像的整体风格与独到面目；建国梵僧观世音的由来及其流布情况，试析在各地的梵僧造像中梵僧的真实面目；最具云南艺术特色的阿嵯耶观音的特殊造像样式、流行的因由以及南诏王室推崇的原因；在东南亚观音佛王视角下，阿嵯耶观音造像的再考察；南诏大理国时期，蜀地造像对大理国的示范作用；此外，权相高氏一门的运作也是本书的一个论述重心，希望借此开拓解读大理佛教造像的另一通道。

虽然南诏大理国相对中原而言地处边陲，但如果把苍洱地区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时空中，其与中原、印度、吐蕃、蜀地等地的战争、商贸和结盟等活动，带动了长期而缓慢的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区域更如同一个文化汇集的“标本”。观世音信仰成为此地王权建构的资源，也是维系王室与地方社会的重要媒介，更是地方社会内

在认同的一种文化指标，对观音造像的解读则不得不考虑这些社会文化动因。

日前，由于对《南诏图传》《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梵像卷》研究的深入、《凤仪北汤天古本》等佛教写经的不断出土问世，以及巍山巍于图山佛教石刻造像、崇圣寺千寻塔与弘圣寺塔塔藏文物、火葬墓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加之对剑川石钟山石窟、佛教典籍、南诏太和城等遗址的发掘、对大理国经幢等石刻艺术研究的深入，使得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和造像艺术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也为观音造像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厚的学术资源。

目 录

自 序	1
引言：仿天竺的“妙香国”	1
一、学术史回溯	1
二、研究思路和叙述程序	5
第一章 梵僧：从“乞地传说”到“建国圣源”	8
一、梵僧显化的垂迹萍踪	8
二、王室与村社：梵僧造像的分向流衍	19
三、《南诏图传》中关于梵僧的几个疑点辨析	35
四、聚焦剑川：梵僧的虚实与石钟山石窟的异域信息	47
第二章 阿嵯耶观音：标准像与王室意志的标举	61
一、“阿嵯耶”观音的称谓与传入	61
二、“混血的艺术”：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渊源再探讨	65
三、“嵯耶”“摩诃罗嵯耶”与阿嵯耶观音	79
四、经略西南边远诸国	97
五、小结	103
第三章 “易长真身”：观音佛王信仰视角下的观音造像	106
一、观音佛王信仰：一个问题的提出	106
二、“内道场”崇圣寺的易长观音造像	110
三、王者造像——佛王信仰的一个解读	123

第四章 大圣慈寺的余温：后理国观音造像的汉系特征	130
一、由《梵像卷》观音造像看大理国信仰结构	131
二、巍山：从早期观音造像看由来已久的中土文化浸染	140
三、成都大圣慈寺的余温：蜀地对大理观音造像的示范效应	150
四、祥云水目山禅系的崛起与大理国佛教造像汉系特征	168
五、权相高氏当国下的大理国历史景深	184
六、小结	196
附 录	200
图版说明与目录	205
参考文献	211
后 记	221

引言：仿天竺的“妙香国”

一、学术史回溯

由于汉文史籍关于南诏大理国的记载语焉不详，而作为主要民族的白族民间流传的典籍在明代沐英、蓝玉、傅友德入滇后几乎焚毁殆尽，“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青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悉付之一炬”^①，在文献典籍、考古材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对大理国史和佛教艺术的研究一直较为迟缓滞后。而且对西南边陲云南特有的民族、语言等沟通的乏力屏蔽了很多人对关注的热情与探求的动力，所以一直颇逊色于对北方敦煌的研究，显得较为粗糙单薄，研究力度和水准尚待提升。草略爬梳一下，南诏大理的佛教艺术研究（包括观音造像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研究轨迹：

（1）对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的研究发轫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外，得益于中国台湾、欧美一些学者的先行引领，这种先导作用的辐射力量直至今日仍在波及扩散，使后继者难以回避。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云南佛教艺术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图式、造像的关注上，如《南诏图传》和《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简称《梵像卷》）等代表性图卷；还有诸如阿嵯耶观音、大黑天神等独特神祇造像的考释等，带动着云南佛教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属于图像推介、发布和命名考释、断代等研究的奠基阶段。

美国 Helen B. Chapin 博士在 1944 年出版的《亚洲研究季刊》

^① 师范纂：《滇系》“典故系”，成文出版社，1968 年。

上撰文介绍《南诏图传》，首次发表了该画卷的全部照片^①，为造型独特的南诏大理阿嵯耶观音像研究之滥觞。Chapin 博士根据她在美国所见的云南观音像，从图像学的角度提出云南观音像与印度有渊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霖灿先生也是敏锐的先行者之一^②，他对南诏国史进行了初步考证，揭示了《梵像卷》在中国绘画史及云南宗教研究方面的主要价值。1967 年刊行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是李霖灿先生研究《梵像卷》及滇地相关佛教文物集大成之作，并且以黑白图版首次披露了《梵像卷》的全部资料。此书考订审慎、资料详尽，学术价值很高，是一部征引率很高的权威性著述。其后，李霖灿发表了《大理国梵像卷的新资料——〈法界源流图〉的发现》《大理梵像卷和法界源流——文殊问疾图的比较研究》《黎明的法界源流图》等，在资料发布及全面追踪研究上成为开拓者和奠基人。1948 年，云南学者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首次在国内介绍《南诏图传》并附图片，但囿于条件，图传的尺寸、详情、下落均不明，附图次序也有所颠倒。1951 年，宋伯胤先生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去剑川考察，撰写并出版了《剑川石窟》一书，拉开了此研究的序幕，剑川石窟等云南的佛教艺术渐渐开始进入学者们的学术视域并不断引起重视。

(2)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对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起色与突破，形成了研究的系列化和集群化，关注的学者大大增多，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并逐渐向纵深精微层面推进，而佛教的传播路线和佛像风格形成的相关因素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大主

① Helen B. Chapin 博士在《哈佛亚洲研究》第 8 卷第 2 号发表《云南的观音像》，1944 年；收录于查尔斯·巴克斯所著，林超民译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② 李霖灿先生早于 1939 年 12 月就赴云南剑川，对石宝山石刻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次年 1 月 17 日写成《剑川石宝山石刻考察记》，但未刊行。20 年后，李霖灿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到《梵像卷》，在 1960 年 5 月 23 日撰就《大理国梵像卷和云南剑川石刻——故宫读画札记之三》，以利贞皇帝与剑川石窟《南诏第五代国王阁罗凤出巡图》（今编 2 号窟）的南诏王冠饰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考订了《梵像卷》的成画年代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年）。

项。代表者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玉珉研究员，她相继发表系列论文，^①在对南诏大理国的佛教图像考释、义理、艺术遗存等研究上，尤其是针对《梵像卷》的研究上多有建树，成为继李霖灿先生之后的又一方重镇。新加坡国立大学古正美教授在对印度南部和东南亚密教观音佛王传统或信仰进行多年的研究之后，认为南诏大理国，包括唐武则天时期的佛教信仰，也具有佛王传统的特点。^②泰国学者 Nandana Chutiwongs 在 *the Iconography of Avalokitesvara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中，对东南亚地区的观音造像作了详细的分析、比较；美国学者 Daviol Snellgroved 的 *the Image of the Buddha* 详述了佛像从印度如何兴起、发展、如何向亚洲地区传播及其在传播中的转变、演变过程。书中特别谈到观音像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并通过东南亚远传云南。在 *the Aavalokitesvara of Yunnan and Some South Bast Asian Connections* 中，英国 John Guy 专门分析了云南观音像与东南亚观音像之间的联系，说明南诏与东南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人 Angela Falco Howard 在《南诏国的鎏金铜观音：西南连疆的混血艺术》中，认为缅甸、泰国、越南对阿嵯耶观音像有影响，称其为“西南边疆的混血艺术”。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在《南诏国的佛教——中印佛教文化的融合》中谈到，南诏国的佛教艺术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半岛的佛教艺术相关。

中国大陆学者起步较晚，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涉猎其中，如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的《南诏史画卷》和《张胜温〈梵画长卷〉》、邱宣充《〈张胜温图卷〉及其摹本研究》、汪宁生《南诏中兴二年画卷考释》、杨晓东《张胜温〈梵像卷〉述

① 如《梵像卷中几尊密教观音之我见》《张胜温梵像卷药师琉璃光佛会与十二大愿之研究》《梵像卷释迦佛会、罗汉及祖师像之研究》《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南诏大理佛教雕刻初探》《南诏大理大黑天图像研究》《南诏佛教考》《石钟山石窟与梵像卷杂考》《〈梵像卷〉作者与年代考》等。

② 古正美的《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时代的“天王传统”》《从南天乌荼王进献的〈华严经〉说起——南天及南海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密教观音佛王传统》《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佛王形象》《南诏、大理的佛教建国信仰》等一系列文章对南诏国的佛王信仰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解释。

考》、温玉成《〈南诏图传〉文字卷考释——南诏国宗教史上的几个问题》、侯冲《南诏大理汉传佛教绘画艺术——张胜温〈梵像卷〉研究》和《大理国对南诏国宗教的认同——石钟山石窟与〈南诏图传〉和张胜温绘〈梵像卷〉的比较研究》等，研究有不断升温趋势。南诏大理阿嵯耶观音造型独特，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云南学者对阿嵯耶观音的研究一直都积极地推进。他们多据云南地方历史文献抒发己见，先后出版、发表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和文章，如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和《南诏观音佛王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李昆声《云南艺术史》、肖明华《所见两尊观音造像与唐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李东红《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的演变——兼论佛教密宗的白族化过程》、张楠《云南观音考释》等，尤其是侯冲先生从北汤天新发现的一大批经卷入手，在南诏大理的佛教信仰及相关造像艺术，如阿吒力教、“滇密”有无、造像的命名辨识等问题上卓有新识。

(3) 进入 21 世纪，南诏大理的佛教美术研究出现协同趋势，除了历史、文化、宗教研究的渗入外，经济、人口、科技、教育、语言、文字等也渐渐被纳入，使得此项研究日渐厚重丰满。在云南剑川和大理分别召开了以剑川石钟山石窟和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 年和 2002 年），南诏大理佛教艺术的影响不断扩大。刘长久《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侯冲《南诏大理国佛教新资料初探》、连瑞枝《王权、系谱与婚姻——从云南洱海地区佛教传说的结构谈名家的形成》、罗炤《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建极大钟之密教图像——兼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篡改》和《隋唐“神僧”与〈南诏图传〉的梵僧——再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伪造与篡改》、傅云仙博士论文《阿嵯耶观音造像研究》（现已出版专著《阿嵯耶观音》）、段玉明《大理国史》等相继撰就，学者们不断找寻新方法，拓宽新视野，把研究引向深入。

二、研究思路和叙述程序

隋唐时期中原、西北等地流传关于“神僧”、“神尼”、智仙、僧伽、万回等佛教僧侣的神术异能的传说和记载；同样，宋朝时期江淮、西蜀等地亦流传泗州僧伽大圣、宝志和尚等信仰与造像。^①这些传说，几经缙侣流俗的附会作用，在俗众渴盼神迹的心理企求下，完成了僧、佛（菩萨）的自体互变，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延续着同一心理模式，南诏大理亦同样流传有关梵僧建国、梵僧服罗刹等神异传说。梵僧何以成为南诏建国神祇，又如何与观世音菩萨画上等号；梵僧形象的流布特点和流衍境遇，尤其是在王室和村社间有着怎样的巨大分野；梵僧虚耶、实耶等，这些都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所以，本书的论述从王室主持绘制的《南诏图传》中建国梵僧开始。这一线索一直延展到元明时期，在中央集权的强力干预下，原有的宗教版图和神祇信仰秩序被打破，而顽固的梵僧信仰渐渐被挤迫到民间村社，一跃成为云南特有的本主信仰，梵僧改头换面，成为慈善祥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长者形象。这一部分的论述侧重植根于云南本土的历史文化，通过梵僧形象的迁徙，挖掘云南异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

梵僧作为来自天竺、代表着正宗法源的佛教神祇，必然会受到南诏王室的青睐，民间对“托言天竺”的外来僧侣非常推崇热捧。所以梵僧成为云南特有的阿嵯耶观音的化现。阿嵯耶观音，堪称云南佛教造像的标志。宽肩细腰的独特造型，使得对其造像样式来源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日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这种样式的观音造像来自东南亚（中南半岛），笔者对此进行了再考证，发现其与

^① 详见罗世平：《敦煌泗州僧伽经像与泗州和尚信仰》，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台北《南海》杂志社合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4-135页；罗炤：《隋唐“神僧”与〈南诏图传〉的梵僧——再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伪造与篡改》，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7-402页；等等。

泰北、占婆等地的佛教造像尤有因缘。这种带有组合、拼装痕迹的造像样式被称为“混血艺术”，其具体来源也许永远是学界悬疑。随之而来的一个疑惑就是：其流行的原因。南诏王室，尤其是南诏王隆舜的推动作用浮出水面。隆舜处于南诏王室的衰落期，其子舜化贞即失国。持续经年的征战杀伐使得南诏有如强弩之末，难以继起。但是与唐交恶的南诏志求独高，渴望学习并且试图摆脱掉唐——这一大邦的文化印痕和身影。祭来自东南亚的阿嵯耶观音这个偶像，即为南诏文化独立的一项举措。隆舜改国号为“大封民国”，自号“摩诃罗嵯耶”；不愿为唐臣属，而愿为兄弟或者“甥舅”等，使得阿嵯耶观音造像成为南诏王室所掌控的、代表王室意志标举的一个象征。在东南亚这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板块中，共通的佛王信仰成为解读阿嵯耶观音造像的又一角度，而大理崇圣寺三塔出土的易长观音、灌顶仪轨、王者造像等都是这一视角下的诠释和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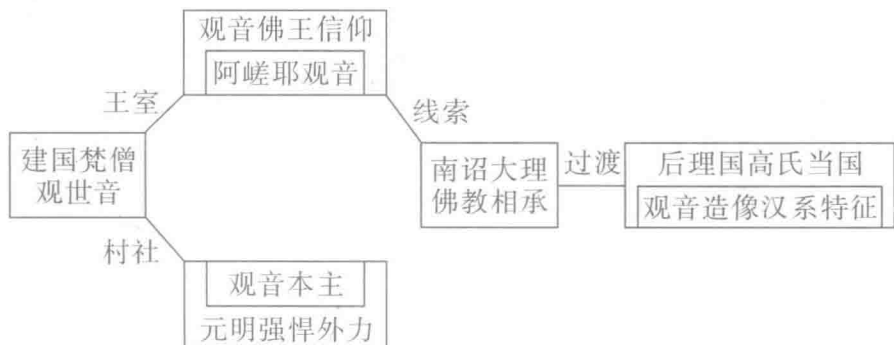
南诏大理国间有佛教信仰的认同观念。大理国的教养阶层更像东晋时期的门阀贵族，长期以来维持着他们既有的高贵身份，而高氏相国一门政治经济势力雄厚，不断透过兴建佛寺、供养僧侣，以作为对宗教的回馈和地方教化的基础，对外界施加影响。高氏后裔在“八府”所扮演的角色，使得佛教与统治阶层结合成为一种具体的权利性行为。那么，我们今天视之为“佛教艺术”的艺术品，包括塔藏文物，实则为他们生活用品和顶礼膜拜、观想的对象而已。如何使佛教艺术品和人群发生一种亲密的内在关联，高氏一门在里面充当什么角色，大理国后期佛教造像风格有哪些转进，研究这些成为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初衷。

大理国与宋朝长期的隔离关系，使得其历史节奏与中原并非同步。当理学已然成为宋朝的官方主流意识时，大理依然保持着对佛教修持与教化的强烈认同。高氏一门苦于宋朝对西南“守内虚外”消极的收缩政策，但又极力示好于宋朝，是乐于与中央王朝保持亲近关系的一股势力。那么后理国佛教艺术在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实则与高氏一门有着紧密的关联。如12世纪中叶修

建大理崇圣寺三塔之一的千寻塔，相国高贞寿即为大施主主持了修缮。而且举凡佛寺、佛寺的土地，有关佛寺的佛像、经典、法器以及僧侣日常所需物质等，也多为高氏捐置。如赵州水目山至少有两位高氏禅宗修持的宗师，分别被奉为水目山禅宗一系开山的二祖、三祖并继承了源于中原禅宗世系的修行道场，因而其佛教艺术必然带有深刻的汉地痕迹。这里，宗教实践不尽是为了某些特定的功能而产生的，高氏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信奉的模式。所以不难理解在大理境内有着截然不同的汉地显宗和密教，不同形式风格的寺院和石窟造像，如安宁市就有明显汉化特征的法华寺石窟造像。这为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个区域性佛教艺术风格提供了有效依据。^① 在各种线索中，对后理国的汉系造像特征的描述占据本书的很大篇幅，中原的示范效应对仰慕中土文化的大理国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因为涉猎的线索、关系很多，也为了行文流畅，所以本书主要选择梵僧（云南本土）、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关系）、成都大圣慈寺为代表的汉系影响（与中原、蜀地关系的一个表征）这三大文化背景来阐述。

叙述程序：



① 1925年，喜龙仁提出佛教美术区域研究的概念。

第一章 梵僧：从“乞地传说” 到“建国圣源”

一、梵僧显化的垂迹萍踪

自南诏大理以来，观世音信仰作为云南佛教的重要表征之一，在云南古代文化史、佛教史、文学史乃至艺术史等诸多领域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苍洱地区的佛教信仰，在云南甚至全国的佛教信仰中具有非常典型的地方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观世音的崇奉往往超过对其他佛教神祇的信仰，在洱海区域的各民族宗教意识中，观世音即被视为佛教的代表。“备受崇奉的佛教缔造者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受到冷落，而位仅列菩萨的观世音却成了最受崇敬的神。这一现象在大理白族先民的佛教文化传统中占据着极为显著的地位。”^① 正如美国学者菲茨杰拉德说的，“在崇奉佛教的大理人看来，没有什么神灵更比观音值得尊崇膜拜与礼赞了”^②。而观世音显化，则是云南古代观世音信仰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表现。“《白古通》载观音显圣，南止蒙舍，北止施浪，东止鸡足，西止云龙，皆近苍洱。而观音显圣最多，载在《通志》凡七化。”^③ 康熙年间喜州圣元寺住持寂裕刊刻的《白国因由》也提及观世音“菩萨累劫救

① 张金鹏：《南诏时期佛教传播中的变异现象及原因探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45页。

② 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7页。

③ 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本：《滇史》卷十二，德宏民族出版社，第324页；《通志》，指李元阳纂的万历《云南通志》，查该志卷十“杂志·大理府·怪异”有“观音七化”条，第4-5页。

护此处，盖有十八化，备载《夔古通》”^①。在元人《记古滇说》、元人赵顺著抄本《夔古通纪浅述》、各本《南诏野史》、清人文果《洱海丛谈》、清圆鼎《滇释纪》等文献中也都有载录。在《白古通记》中，同样载有关于“观世音显化”的内容，还新编加出观世音降服罗刹、观世音负石阻兵等灵异故事来。

观世音伏罗刹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元代佚名的《白古通记》中，“僧解袈裟一展，盖其国都；叫犬令跃，一跃尽其东西，再跃尽其南北”^②。《夔古通纪》亦有类似载录，“僧以袈裟一展，遍周国界；令犬四跳，达乎四境”^③，大体情节相仿，细节略有出入。据考，观世音信仰起源的一种推论为自古相传的在印度大陆南端海上解救“黑风海难”和“罗刹鬼难”的信仰，最初形态既不是净土接引信仰，也不是智慧解脱信仰，而是现世救难信仰。经过不断加工完善，最终定型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璩、玛瑙、珊瑚、虎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④

解救“黑风”“罗刹”之难的圣者便固定为菩萨，以这种信仰的核心环节即观察世间众生之“观”与世间众生称名之“音”的完整结合来命名为“观世音”。^⑤徐嘉瑞引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及《西藏图考》“艺文考”注，谓大理罗刹神话“显然由拉萨之罗刹神话，压缩转移而来”。依据是大理观音于上阳溪化金宝楼台封闭罗刹建罗刹阁塔镇之，乃文成公主建大昭寺以镇罗刹心窍“窝塘

① 寂裕：《白国因由》，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98年，第29-30页。

② 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③ 尤中校注：《夔古通纪浅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④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正藏》（第9册），第57页。

⑤ 李利安：《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第22、第24页。